

把传统文化智慧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

——专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

■ 本报记者 朱晨辉

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对现代企业管理产生影响?近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的采访时指出,“对于企业的微观管理活动,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都可以提供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道家的处世哲学、法家的规则意识、兵家的权谋韬略,在现代企业管理和商业竞争中都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和再创造力。”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不断深入

采访中,张亚光特意强调:北京大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及独特优势,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编写国内最早的中国管理思想史教程,近些年来更是为众多优秀企业家深入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精髓提供了高端的教育平台。

曾经发表“建国60周年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2010)和“中国古代经济周期理论及其政策启示”(2012)并两次荣获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优秀成果一等奖的张亚光副教授,本人还是国家一级学术团体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秘书长,对传统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成果,由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子课题《海外视域下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就是希望能在这些领

域取得一些进展,加深大家对多元文化的理解,重新认识中国经济思想对世界的贡献。

张亚光告诉记者,中国经济思想史是理论经济学里面二级学科经济思想史的分支,这个学科研究的是有关中国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和变革的学问。传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主要对象是人物,比如研究孔子的经济思想、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孙中山的经济思想、陈云的经济思想等等。北京大学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包括管理思想史)研究的传统重镇,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望。

“我的师祖赵靖先生和石世奇先生筚路蓝缕,编著《中国经济思想通史》5卷本,树立了这个学科的高耸丰碑。我的导师郑学益教授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和海外华商思想等领域有开创性的贡献。我的同事周建波教授对晋商和宗教经济思想有独到的研究。随着学科不断发展,近些年来我个人更偏重于原始文本的研读和文献数据库的使用,同时也关注非精英的‘中人’或佚名者在经济思想史上的留痕。此外,随着我们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西方学者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家们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优秀元素越来越充满兴趣。最近两年我还有一部分工作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双向交流,一方面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介绍到西方学术界,另一方面将西方话语体系中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发掘并引入回国内。”张亚光表示。



张亚光

传统文化对现代经济发展有启示意义

关于传统文化和经济的关系,张亚光也有着许多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可以从多个角度来探讨。

“从宏观经济增长角度而言,学界已经有许多经典文献认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东亚奇迹与中国的儒家文化有很强的关联。这种研究有文化决定论的意味,遵循的是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框架。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例如林毅夫教授质问儒家文化的影响一直存在,但何以直到当时而非之前才出现东亚奇迹,其实韦伯自己说

的很明确,他是反对‘历史单一因素决定论’的。我个人的观点则倾向于认为儒家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对现代经济成长是有帮助的,而且就是在‘当时当地’。”张亚光说,我们不能因为之前没有好的结果就否认后来的影响。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也不可能是适用于各个时代的。即便自己没有发生变化,外部世界也是会变化的。东亚奇迹就是儒家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机遇下、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所发生的。我们不能因为近代东亚备受欺凌就彻底否认儒家文化,也不能因为曾经的东亚奇迹而迷信儒家文化。时移世易,凡事都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这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区别。

张亚光指出,传统文化中的

许多智慧,对今天的经济政策制定和微观企业管理仍然有着极强的启示意义。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无非是两大思潮,一是国家干预主义,二是经济自由主义。这两点在中国古代很早就被充分的阐发出来,并且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我们称之为“轻重论”,反映的是政府如何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调控市场运行的思想,例如对市场的监管、对盐铁的专卖等等,尤其是“常平仓”的思想和实践,有学者认为对美国罗斯福时期的粮食储备制度提供了借鉴。后者我们称之为“善因论”,出处是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认为“善者因之”,政府对待私人经济活动最好的态度就是顺其自然,顺应民间的需求。最不可取的则是直接与民争利。根据上海财经大学谈敏教授的研究,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响。《国富论》里面那只“看不见的手”,和中国古代的自由经济思想是有密切联系的。

张亚光强调,政府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了高度重视,赋予了特殊的地位。这既是当前治国理政的现实需要,也是时代对传统思想精神的呼唤。党中央提出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多年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验表明,只有坚持自己的道路,才能看到别样的风景;只有相信自己的文化,才能获得世界的尊重。

李树森:由学术主导的话语权是中国美术复兴的关键

■ 本报记者 朱晨辉

日前,中国画强元课题组负责人李树森作为策展人在人民日报社举办了“中国画强元课题10人学术提名展”,力图以学术作为新的标准,为中国美术复兴趟出一条新路,引起业界高度关注。

新评判标准打破常规

在提名展开幕式上,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张建星致辞说:“这个课题与这场展览,是站在国家文化复兴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的高度上,来推动民族艺术复兴的具体实践。我们要做时代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尽到我们应有的一份责任与义务。”

就中华文化艺术的复兴问题,李树森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很多机构与有识之士都在为中华文化复兴这一目标思考、努力,希望让艺术去伪存真,健康发展。《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对中华文化复兴问题进行了多年调查、思考与研究,为此还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通过发



李树森

表的数万字课题研究文章,提出了新的路径、思路与理念。课题里所谓“强元”,就是在尊重“多元”,包容“多元”前提之下,强中国美术这“一元”,强中国文化这“一元”。

此次提名展,从入展画家选择上来看是非常慎重的,不看官位,不看名气,不看市场,不看价格,只看学术,而且只看高端学术,为的是用真正的学术成果推动中国美术复兴。“每位入展画家

都有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的面貌、个人独特的风格,尤其具有各自学术上的深度探索或独到建树。我们对这样的入展条件做到了严格把关。”李树森说。

此次展览,人民日报社以推动民族文化艺术复兴为目标,以“中国画强元课题”研究独特视角与新评判标准组织的这次10人展,对画家的选择条件上只看作品的学术水平,这对近几十年来

艺术市场鱼龙混杂的中国美术界而言,显然打破了办展常规,也超越了常规,其内涵与价值将影响深远,对推动中国美术复兴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正因此,著名美术理论家陈传席先生称之为“在中华文化复兴征程中的一次重要的文化事件”。当前中国的文艺复兴确实需要更多这样的文化事件,中国文化艺术界亦当以此为契机,开启文艺新风,推动强中国文化这“一元”,使我们中国的当代艺术在世界艺术舞台上独树一帜,掌握重要话语权,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应负的责任与努力的目标。

作品实力决定话语权

李树森说,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美术发展问题的实质之一是话语权争夺的问题。对于中国美术领域而言,话语权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美术发展方向与民族艺术命运的大问题。我们需要改变话语权错乱的局面,话语权不能总被向西方鹦鹉学舌之人占据高枝,不能被

西方意识形态有意或无意地掌控,不能任由不健康的市场与金钱左右,不能被欺世盗名的“大师”主导。那么,为什么不树立一批我们自己的艺术家呢?我们课题组推动建设的中国画学术精英群体,就是在探索树立一批民族艺术的标杆。我们正在做这样的艺术家筛选探索,并将通过展览、论坛、宣传等措施,有计划地展开相关工作。李树森强调说,话语权并不等同于官位,国家和相关机构给予艺术家学术地位与成就的认可与尊重,让他们发挥出与作品学术成就相匹配的影响力就是最好的话语权。而这样的由学术主导的话语权,正是中国美术复兴的关键。

在世界艺术舞台上,中国画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话语权直接关系到中国美术在世界地位的问题。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强国,中国美术将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话语权也会快速提升。而话语权地位的强、长久也只能靠作品实力说话,这愈发显示出中国画“强元”建设的必要。